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文本 中的教育权利诉求

骆 莉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教育；权利诉求

[摘要]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政府为了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不断地推进教育马来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则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法令的限制下遭到严重的打击。本文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兼收马华其他主要报刊对华小高职事件、“综合小学计划”和“宏愿小学计划”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华文报刊的文本表达中，探索和把握华人争取教育权益的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 D634.3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0)05-0065-07

The Demanding for Education Right and Interes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Luo L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Papers and Periodicals; Education; Right and Interest Demand

Abstract: Malaysian government has constantly carried forward the education Malaysiation policy in order to buildup a unified nation consciousness after its independence. Chinese education suffers a lot under the restriction by a series of education decree in Malaysia.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hinese strive and road for their education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studying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pers and periodicals, mainly from the comments about the assignment of non-Chinese high rank official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 Comprehensive Primary School Project and Big-will Primary School Project in Sin Chew Daily, NANYANG SIANG PAU and others.

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华文教育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自从华文教育开办以来，华为坚守自己的文化之根，历尽艰辛，不屈不挠，用血与泪谱写了一曲曲悲壮之歌。马来西亚华人如此看重华文教育，是因为将其作为本民族文化薪传的不绝之根，正如马华前教总^①主席沈慕羽先生所言：“语文是民族的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好比是无根的树木，要消灭一个民族，必先消灭其语文，若要保存文化，薪传不绝，必须从教育做起。”^[1]在华社的共同努力下，华文教育经历近 200 年的发展，在马

来西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20 世纪 50 年代，马来亚开始迈向自治，马来人民族主义思潮膨胀，要把马来亚建成一个马来民族的国家，以马来文化为主，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在这个历史的非常时期，华人的国家意识以及文化和国家认同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由于教育直接牵涉到国家的效忠和认同问题，所以，它自然成为整合国家民族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0-09-08

[作者简介] 骆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5 级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① 教总，即马来西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的简称。

其实，华人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历经百年沧桑，并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迁。华文教育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逐渐本土化，这是一个文化自然涵化的过程。但是，在马来西亚，要建立一个以马来人为主体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塑造一个具有共同国家意识的国族，政治权力对华文教育的调控尽管生硬，但却极为有效。马来政府没有耐心等待三大民族之间爱情长跑后的情投意合的自然结合，因为这需要时间。于是，从 1951 年《巴恩报告书》开始，历经 1951 年的《拉萨报告书》、《1952 年教育法令》、1954 年的 67 号白皮书以及 1957 年的教育法令，一直到马来西亚独立为止，教育法令及报告书如雪纷飞，不停地飘落华社，其宣示的主调只有一个：教育马来化，教育本地化。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国家实施教育最终一个目标的决心日益坚定，而华文教育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法令的限制下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到 1969 年时，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奄奄一息，仅存苟延残喘的 9 间。华文教育陷入低潮，面临有史以来最艰难的困境。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华族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文化自救运动，迎来了 20 世纪 70 年代华文独立中学的复兴。进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形势和马来西亚国内情况的变化，华文教育的环境也随之改善。尤其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影响的扩大，华语的地位和价值也得到提高。马来西亚政府为实现 2020 年先进国宏愿，也顺应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宣称放弃种族政治，以争取华族民心，对华文教育的压力因此稍加放松，华文教育危机渐见纾解，呈现生机。然而，华文教育问题并未因此一蹴而就，挫折和困难依然存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华文教育应如何进行自我调整，抓住机遇并创新发展，成为这个时期华人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为华社的精神家园，华文报刊无时不在反映华人的心声。对关涉华人文化之根存亡的教育问题，华文报刊从来都是十分关注的。在不同的时期，华文报刊都会对华文教育面临的问题进行报道，并且发表关于教育的言论，表达华人社会的诉求。本文以 20 世纪 80、90 年代《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兼收马华其他主要报刊对华小高职事件、“综合小学计划”和“宏愿小学计划”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华文报刊的文本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及其权益的争取。

一 母语教育权力的抗争

坚持母语教育是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的共识，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路历来坎坷多难。进入 20 世纪 80、90 年代，虽然华文教育面临的压力有所舒缓，但是，相关的冲突事件依然不断。争取和捍卫母语教育权力，在华文报刊中依然是一个重要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华文报刊围绕华小高职事件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人这种舆论的伸张。

1987 年，马来西亚教育部委派了 200 名不懂华文的教师到华小担任高级职务。这件事在华社掀起轩然大波，华社认为这是政府改变华小媒介语言的前奏，一致表示反对。10 月 11 日三大华人政党和 15 个华人社团在吉隆坡天后宫集会商议对策，而受影响的学校也开始了罢课行动。在马来社会方面，对此事件的回应也日趋激烈。10 月 17 日，巫统青年团举行了一个 15,000 人的集会。接下来巫统借建党 41 周年纪念的机会，又宣布 11 月 1 日将在吉隆坡默迪卡体育场举行 50 万人的大集会。吉隆坡气氛一时非常紧张。首相马哈蒂尔一边呼吁国人冷静，一边动用《内部安全法》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即所谓的“茅草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华人社会的重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尽管华人再次遭受打击，但维护华文教育的决心反而更坚定。

关于华小高职事件，华人报刊对此十分关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并发表言论，伸张华人维护母语教育的权力。1987 年 10 月 10 日，《南洋商报》发表社评《一致行动维护华教》，对华人团体以及华人三大政党携手合作，就华文小学高职事件共同维护民族教育大业的行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有意义的突破性进展，象征着华人社会的更大觉醒与团结。在华小高职事件发生后，全国 15 个华人团体行动委员会以及一些政党召开了联席会议，作出三个重要决定：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采取共同立场处理不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调升华文小学的问题，全力支持华文小学准备罢课的决定，以及举行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社论认为，“华人团体与华裔政党在捍卫民主权利的大前提下，能够不分党派，团结一致，去应付华文教育和华族前途面对的挑战，委实难能可贵。”^[2]

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和政治密切相关。在华文教育的发展史上，几乎没有一次事件是“纯粹”的文化或教育之争，无论是小事件如中学甄拔考试、师资教材，还是大原则如教学媒介国语的

“最终目标”等，无不是政治较量和斗争的表现。在为华文教育抗争的过程中，参与联盟政府执政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所持的立场与董教总^①时有分歧，与华社的意见也时常相左。在1956年国家独立前夕，全马华团曾联合提出将华语、马来语、英语列为官方语文的要求，但马华公会却认为：“由于马华在独立期间，为了交换华人的公民权及政治利益，已接纳巫英文为官方语文，因此不能背叛诺言去支持华文语言运动。”^[3]马华公会的这一态度使华人社会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的行动受挫。《1961年教育法令》公布后，在华文独中的改制事件和华人争取成立独立大学的事件中，马华公会也采取了不支持甚或是与华社截然不同的反对立场，使得华人社会在华文教育问题上难以团结一致，华文教育在政府的凌厉攻势下，只能步步为营。

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华人社会之所以面临诸多难题，固然出于当局施政的偏差，但是华人社会内部缺乏凝聚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人各党团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应有的默契与协调，使种族政治势力有机可乘，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语文与教育领域还时常出现侵犯华族权利的试探性政令和举措，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南洋商报》通过发表社论，呼吁华裔族群的华团与各华裔政党合作，维护华人社会权益。社论告诫人们，华文小学调升问题已经在教育部与华人社会之间形成了对抗性局面，如果不妥善解决，对国家和人民都可能带来不良的后果。华人社会反对不具有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华文小学行政要职，就是要确保华文小学不变质，不含有宗族的立场。如果马来人拥有华文教育资格，华人团体也会接受其为教师，正如华文小学也有许多马来学生一样。华文小学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政府没有好好加强华文小学师资的结果。华人社会反对教育部有关调升措施是坚决的。华文小学为抗拒教育部的不合理措施准备发动罢课行动，一些州准备举行抗议大集会，并准备在全国发动甘地式的不合作运动，这是华人社会不满情绪的具体反映。当局应该正视华人社会表达的公意，顺应民意，纠正措施，使有关问题所引起的风波早日平息下来^[4]。

华人社会和华人报纸在针对直接危及华文教育利益的政府法令和举措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是相当明确和坚定的。在这次事件中，华人行动党、民政党和中华大会堂等华团能够团结一致，共同争取华

教权益，华族深感欣慰并为之振奋。1987年10月12日，反对党行动党在国会的预算案会议上成功地提出了有关华文教育的紧急动议。而在过去，反对党曾多次尝试提出这类动议，却鲜有成功。因为这类动议只有在三个要点皆备的情况下方能获准提出，即它必须是个明确的课题，属紧急性质，且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行动党首次成功地提出符合三个要点而获准提出辩论的动议，使得华人议员可在国会中就此问题与巫统议员们展开激烈的辩论。而这一情况，无疑让巫统方面感到恐慌，也进一步激怒了巫统，巫统与马华公会的直接对抗是愈见明显。1987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再度发表言论，对华人社团与政党联合起来维护华教表示了肯定。称“马华此次是首次与行动党、民政党及中华大会堂等华团，找到共同的斗争目标”^[5]。在华人政党内，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是执政联盟政府中的政党，而行动党是在野的华人政党，这三大政党因华社共同关注的问题，携手合作，与华人社团一致面对巫统，这是此前罕有的现象。

继1987年10月10日华团与华人政党在天后宫举行大集会后，华人家长准备响应华校15日至17日的3天罢课行动；而巫统青年团也在17日举行大集会，并宣称在11月1日还要举行50万人大集会。华巫两族对峙加剧，事态进一步激化，1969年“5·13事件”种族冲突事件似乎又将重演。从《南洋商报》陈志勤的文章《华小高职事件的风波》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因华文教育问题导致的华巫两族的紧张冲突程度。在文章中，作者也传达了华人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国家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努力消除种族隔膜，加强相互友好及容忍尊重的精神。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往往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所以应该从学校开始向学生灌输了解及尊重其他族群感受的重要性，这方面的工作在种族两极分化现象趋于恶化的今天显得尤其重要。国家应该尊重大马的不同文化，在多元文化中吸取精华，美化生活^[6]。

对于华小高职事件，其他华文报纸也表达了同样的关注，《星洲日报》在这次维护华文教育权益的抗争中为华社摇旗呐喊，甚至因此在“茅草行动”中遭到政府查封。

1987年10月27日，马哈蒂尔政府为遏制逐步升级的华巫冲突，展开“茅草行动”，扣留了106名异议分子。隔日，包括《星洲日报》和英文

^① 董教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简称“董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联合总会简称“教总”，这两个组织常常合称为“董教总”。

《星报》(The Star) 在内的多家报纸，皆以“大逮捕行动”作为头条新闻。

1987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星洲日报》头条新闻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吉祥晃昇等人被扣包括卡巴星林冠英胡雪邦陈财和》。这篇新闻在第一段如此写到：

多名华教界及政界人士，今天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警方扣留。已经证实在内安法令下遭扣留的人士包括董总主席林晃昇，国会反对党领袖、行动党的林吉祥、卡巴星、胡雪邦、林冠英和郭金福，雪州董联会理事廖忠明、马青副总团长陈财和上议员、农科大学讲师陈嘉庆及国民觉醒运动主席真德拉博士。

不料在新闻刊出后的当天，《星洲日报》及其他两家报社惨遭当时的内政部吊销出版准证，一直到 5 个月之后，内政部才重新发给这 3 家报社出版准证。内政部曾在 1988 年 3 月发布白皮书，宣称上述 3 家报社“刻意突出敏感课题，为个别族群利益斗争，罔顾对族群和谐、公共秩序及国家安全造成的后果”，因此才被令停刊^[7]。

华小高职事件最后以政府实施大逮捕的“茅草行动”而告终。华人争取教育权力的行动一再被政府所压制，所幸的是类似“513 事件”式的种族流血事件没有重演。疾风暴雨之后，华巫两族似乎都冷静地对此问题进行了反思。事后，国家教育部通令今后将明文规定，担任华文小学 4 项行政高职的教员，至少须拥有初级文凭华文资格。这项行政措施的推行，意味着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升调华小行政高职的问题今后不会重演。华社对此表示欣慰，同时也对此事件进行了省思。1988 年 2 月 5 日，《南洋商报》发表社评，认为这次事件很不幸地曾导致华巫两族民众情绪高涨的对抗局面，现在通过高层协商和行政管理层面的调整获得圆满解决，马来西亚人民有如上了宝贵的种族政治的一堂课。华小高职升调问题原本只是相当简单的教育行政问题，尔后演变成很大的争论，险些酿成种族冲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抗争，问题基本上获得妥善解决，华人深感宽慰^[8]。

华小高职事件虽获妥善解决，但是，华社对华文教育的担忧并未解除。尽管教育部明文规定，担任华文小学行政高职的教员至少须拥有初级文凭华文资格，但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当局调派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小任职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华文教育在

国家教育体制中被边缘化，加上马来官员在行政执行上的偏差，华社对教育部的举措，时常抱着警惕的态度，甚至较为敏感。在华小高职事件过去 10 年后的 1998 年，《星洲日报》发表言论，指出华小教师的华文资格问题，在过去 10 年中几乎年年重演，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当局行政偏差的阴影下，华小教育除了高职问题之外，还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就读华小的适龄儿童（包括华裔和非华裔）的人数越来越多，而华小数量却没有增加，增建华小变得十分迫切；二是由于缺乏政府经费支持，华小师资短缺。在看到客观环境对华小发展的种种限制后，文章提醒华文教育界必须对此有清醒的估计，在可见的将来，预计政府官员的行政偏差仍将会在华小问题上纠缠不清，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政策确有松绑的情况下，大马政府已立意要将本国中学纳入东盟区域内的教育中学，开放各种限制已是必然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华文教育界应该尝试对一些原则性的课题进行争取^[9]。

由此可见，坚持华语为母语教育是萦绕华人心中的一个深深的历史情结。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不管国际国内形势如何变化，华人在这个问题上依然执著不懈。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数十年来支持与维护华文教育波澜壮阔的斗争，主要基于一个民族的根源与历史。没有“根”的民族是不会令人尊重的，而“根”一旦被切断，也无法吸取民族文化的滋养和精华，就会发生失落的文化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华文教育运动能广泛、深入及全面获得华社响应与支持的原因。

二 关于华文教育与国家意识的省思

1. “综合小学计划”与国民团结

在马来政府看来，在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里，教育应该是形成国民团结、建构统一国家意识的工具。所需的教育制度应该是一个统合国家意识的制度，而学校应该是一个促进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最合适的场所，通过一个共同的语言，增强民族间的团结。华人并不完全否认这个理论，认为各族儿童在一起成长，会增加彼此间的了解，但把孩子都放进统合学校，不一定会促成国民团结。因为共同语文的推行是不能建立在压制其他语文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公平对待各族教育，华族是很难接受统合学校的^[10]。

1984 年 8 月 9 日，在一个马来学者的研讨会上，有人认为，华裔家长把子女送入华小造成了种族极化，提出把各源流小学联合在一起的“综合

小学计划”。1985年8月5日，马来西亚教育部长宣布了推行小学综合学校计划的决定。该计划的内容是从1986年开始甄选18间小学，把华小、巫小和印小三个不同源流的小学集中在同一个校园上课。计划宣布后不久，当局便在柔佛州设立了第一间“综合学校”。联系1984年吉隆坡直辖区教育局通告所有华小，命令他们在学校集会及其他活动中必须用国语事件，以及马六甲一所学校的华文学会被禁止出版刊物的事件，华人认为当局的举措是以团结各族学生为由，却暗含消灭华小和印小的意图，这在华人社会中引起了骚动。华文学校的董事部、教师及其他团体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向当局提呈备忘录以示抗议，重申国民型小学的特质，包括教学媒介语、教材、考试媒介及行政上的语言都必须受到保护。教总副主席陆庭渝先生甚至在教育部办事处外静坐以示抗议，得到广大华社的支持。而华文报刊对此事也发表言论，表达华人的呼声。

1985年11月7日，《星洲日报》发表钟天祥的文章《综合学校计划掀起反对浪潮》，表达了华社对此事的态度。文章认为教育部长宣布准备推行的小学综合学校计划，让华人社会感到担忧和震动，引起了民间情绪高涨。华人教育人士表示了更强烈的反对，提出要尽快召开全国华团及政党代表大会，商讨如何有效地促使政府取消这一计划。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问题极为敏感，回顾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近200年风雨飘摇的历程，他们不由对华小的生存而担忧。文章指出政府政策完全忽视华小校舍不足、师资短缺、经费不足等等不公平的现象，再联系最近几年政府不容许建立华文大学、在3M制事件中限制华文小学课程设置、规定学校某会必须用马来语，以及政府高官指责华人家长送子女进华文小学是造成种族两极分化的根源等事件，担忧政府推行综合学校的计划，是要改变华文小学。

文章还批评当局在推行综合学校计划的过程中自行其是的做法。由于事先没有征询华人社会和印度人社会，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团体以及有关学校董事会的意见，甚至不顾他们的反对断然行事，这必然会引起华社的震荡。对于董教总希望尽快会见教育部长，要求澄清一些基本问题的声明，教育部长避而不答。作者认为这“大有漠视华社之态”。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局言行不一的行为。

在这次事件中，教育部华裔副部长林良实在回复华社时否认综合学校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华文

和印度文小学。林良实也不同意1984年8月7日《马来西亚前锋报》社论中希望综合小学为各族儿童在同一屋檐下以共同语文上课开路的观点。但是，教育部长在8月22日接受《祖国日报》采访时却表示，他已经指示将三种源流学校，即华小、印小和国小都集合在综合小学计划下，共同参与各项教育改革。他认为各族学生除了学习他们的母语外，还必须通过共同的课程来学习马来文，通过共同的课程来应用马来西亚语文，接受达致全民团结的教育。“当林良实向华社做出保证的时候，另一方面却有引起华社恐慌的言论出现在别的报章上”，文章因此对当局这种含糊不清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当局没有适当地协调，终使综合学校计划越闹越糟糕”^[11]。

在华人看来，导致种族极化、影响民族团结的原因不是母语教育，而是母语学校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新明日报》对此问题发表《尊重各族教育权利》一文，尖锐地指出，国民团结的问题不在于学校的统合，实质上是各族权利的公平问题。文章指出，一些马来官认为各族学童从小就在不同源流的学校就读，受到种族隔离，将会导致各族学生之间产生仇恨和对抗心理的论调是经不起客观理性分析的，认为这种只要将各族学童安排在一起学习和生活就能解决大马种族问题的想法和主张是天真幼稚的。文章谈到，种族问题的产生，主要不在于各族间接触与否，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是否公平合理，各族是否得到公平的权利和机会，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将国内种族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华文小学和印度文小学的存在，反而是造成种族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不得以各种理由加以歧视或者剥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之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尊重基本人权，各族以一种相互了解、容忍和友爱的精神相处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侵害，那么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就会受到质疑。总的来说，各族的教育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各种源流学校的存在和发展应该受到保护，政府的教育法令应该照顾和保护多元种族社会的特性，这样才符合国家宪法的精神^[12]。

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华教

人士已逐渐将捍卫母语教育提升到争取民主人权的高度，从而使华文教育运动在实质及舆论上都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2. “宏愿小学计划”与国家教育最终目标

华人针对综合学校计划展开的各种广泛抗议行动，最后取得了成效，当局最终接受了华教界的要求，把相关计划暂时搁置下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1995年12月，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向教育部提呈了一个《宏愿学校概念与执行》的计划书，再度提出小学教学媒介语问题。计划书明确指出：“在达到国家团结目标方面，教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1956年拉萨报告书为骨干的国家教育政策，明确地强调教育政策的目的，是作为团结国民的工具，特别是在小学方面。因此，国语作为各源流学校一致媒介语，是最重要的一环，而且必须逐步全面实行。”^[13]紧接着国会通过了翌年起实施《1996年教育法令》的决定，也就是说，政府正在将马来文作为小学教学媒介语这一最终目标逐步变成现行目标。“宏愿小学计划”则是教育部针对小型华小在生源、经费、师资和设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实施《1996年教育法令》进而合并华小的一项具体措施。

1997年6月，教育部部长在哥大丁宜南亚学校为宏愿学校举行推介礼，并宣布以南亚学校作为宏愿学校的模式^①，开始正式推行实施“宏愿学校计划”，这引起了华社尤其是华教界的高度警惕。正如一些华教界人士所言，“‘综合学校’是寿终正寝了，不过，‘宏愿小学’是借尸还魂的厉鬼，还是完全脱胎换骨的先锋，目前还言之过早。”^[14]在这一问题上，教育部是用心良苦，还是另有居心，华社一时难以断言。毕竟华小面临经费短缺、师资匮乏的问题，而且几十年来全国华小数量没有增加，华人人口却增长很快，尤其是在华人人口密集的地方，华小远远不能完全接纳本地学生。如果如报道所言，“宏愿小学”将在全国兴建，华社可以增加10多所归属在“宏愿小学”中的华小，这对华社而言是福还是祸？华人心存疑虑。增加华小是华社心愿，但是，保留母语更是华人心结。《从综合小学计划到宏愿小学》一文表达出华人的希望，即华小应该在学生最纯的时期，用学生最容易了解的语言——母语来灌输团结、爱国等思想，提高社会意识。对此，华小领导组织应该认真地思考、策划并付诸行动，真正地进行一些有助各族互

相了解、促进亲善团结的活动^[15]。

在对待这件事情上，华教界人士的态度是一如既往地坚决反对。最令他们担心的还是有关国语成为教学媒介语的问题。在1996年3月的“挑战与革新——全国华教工作研讨会”上，华教界人士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上，董总在总结报告上明确表明了态度，认为政府提出“宏愿小学”的概念，基本上是“综合小学”的翻版，也许在具体做法上和“综合小学”不完全一样，但其理论依据还是接触论，认为只要把学生放在一起，接触多了就可以相互自然了解。华教界则认为，如果民族矛盾不消除，冲突只会加剧。

在报告中，董总还指出真的设立宏愿小学将会带来的后果，即学生家长基于国民宏愿小学有一科华文的前提下，把孩子送到国小去；华小在籍学生见到国小学校设备好，将产生嫉妒之心，对团结更为不利；华小增添设备，要与隔邻学校竞争，又得向华社筹款，增加华社负担；等等。基于上述分析，董总提醒华社必须关注教育部可能实施的宏愿小学计划，确保华小不会变质^[16]。

对于宏愿小学问题，华文报刊的反应则相对平淡。1996年6月16日，教育部长在南华小学举行宏愿小学的推介礼，《星洲日报》对此事并没有进行报道。笔者查阅了此后半个月的《星洲日报》，尽管该报依然关心华教问题，比如，关于华小建设或是华文学习的报道言论有20篇，但没有看到一篇关于宏愿小学的直接报道和评论。在这半个月的《星洲日报》中，6月17日《言路》专栏袁悦昌的《勿对华教前途掉以轻心》，主要是批评民政党支持华教不力，致使华教前途依然令人担忧。6月24日的社论《同心协力提升华语水平》，是对当时马华文化界和媒体界联合举办的“讲好华语”一系列活动所做的评价。6月29日《国内》栏目发表了董教总的一篇题为《最终目标已变现行目标》的文章。文章是针对民政党对华教支持不力而发。对于民政党人士认为“1996年教育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17]的说法，董教总在此予以反驳，指出1996年的新教育法令实行把各族儿童集合于一个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教育制度，把大马教育制度的最终目标变成了现行目标，这个新教育法令比以往的各项法令更严峻。文章认为华教今后如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绝不是托1996年教育法令之

^① 南亚综合小学的模式，其非语文课如体育、美术和音乐都不是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各源流学校在一起进行的课外活动如运动会、教师节和儿童节等等，以及课外的媒介语均为马来语。对此，董教总认为南亚华小已经变质，是坚决反对的。

福，而只能是由于华社维护华教的坚定决心和艰苦奋斗的结果。

从报刊发表的报道言论来看，在对待宏愿小学事件上，华文报刊的态度相比华教界显得谨慎小心。报刊并没有就这一事件发表直接针对政府的相关报道和言论，而是以华社之间对华教问题的争议来表现华人对此问题的关注，既表现出对华教的一向关怀，也体现出鉴于华小高职事件中“茅草行动”对报社的查封，避免采取过激反应而导致与政府直接冲突的冷静态度。

对于报社的做法，华教界人士颇有异议。《我国华教工作的当前任务》一文就指出华教的发展有一股逆流，使华教在社会动员上力有未逮。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尽管媒体资讯发达，但由于受到一定的限制，有时并未充分反映事实。华社对新教育法令的看法，以及董教总之前与政党的对话，媒介在讯息传达上，并未反映华教工作者普遍的心声，甚至未突显其中的“不协调”，以致社会仍然存在一些“开放”的假象^[18]。

不管是“综合小学计划”还是“宏愿小学”的兴建，甚或是后来新颁布的《1996年教育法令》，华社在华小以母语为教学媒介语进行分流教学问题上，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华社始终坚持认为“认同和效忠”是教育的目的，而“课程内容”是手段，“语文”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手段正确，就必然可以达到目标，和工具无关。维护华教发展，华文报刊也一向如此，只是殊途同归，在具体做法上各自不同，意见分歧也在所难免。

三 结语

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环境压力有所舒缓。1996年底，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接受《时代周刊》的访问时曾发表了较为开明的言论，“以前的观念是人民应该100%马来化才可以成为马来西亚人。我们现在接受这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我们应该在把我们分隔开来的各种隔阂之间建立起桥梁，而不是试图将这些隔阂完全去除。我们不想使所有的华人

改信回教，我们告诉我们的回教同胞，不应该强迫别人改信回教。”^[19]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显示了大马华文教育处在一个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马来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确实实施了一些开放措施。比如，在1997年允许华社开办新纪元学院，允许南方学院设立中文系等。在新形势下，华人在坚持母语教育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华文教育的改革，从华文报刊的一些言论文章中，可以看到华人在新形势下华文教育观念的改变和发展。

首先是超越族群观念，提倡加强国语——马来语的学习。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一些华人也积极提倡现实主义的教育观点。《星洲日报》刊载的文章认为教育不能脱离客观现实，华文独中在不妨碍母语教育的原则下，应加强对英文和马来文的教学。以母语之外的其他语文来学习，也同样能有效地掌握有关的学科知识^[20]。《南洋商报》也刊发文章，对华小国语程度低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教学改进建议^[21]。这些文章的观点，表现了华人教育观念的多元化发展。

其次是强调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教育问题。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问题高度政治化由来已久，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时期，华社希望政府当局完全从教育的角度来处理和解决华教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将教育问题政治化的现象减到最低限度。《星洲日报》社论文章《从政策层面解决华教问题》就表达了华社这样的意愿，认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华教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把华教列为国家教育的一环，制定一贯性的制度化政策，并且在推行的时候注重延续性，不因人事的变动而有所更易，这样才能避免由于个别官员的行政偏差而激化种族情绪^[22]。此外，华团在争取教育权益时，也应该以冷静的方式进行。1999年12月21日的《星洲日报》社论就提到，华教问题经常受到政治的干扰，以致历尽波折。在华教面临新发展的时机，董教总和华社必须继续努力，争取以说理的方式促使政府改变以单元文化为最终目标的教育法令和政策，让马来西亚的教育真正迈向多元和开放。

【注释】

[1] 沈慕羽：《凝聚着血泪的大马华文教育》，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8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年出版，第458页。

[2] 《一致行动维护华教》，《南洋商报》社论，1987年10月10日。

[3] 《教总33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出版，

1981年，第482—483页。

[4] 同[2]。

[5] 《南洋商报》社论，1987年10月28日。

[6] 陈志勤：《华小高职事件的风波》，《南洋商报》1987年10月28日。

法翰太子和全西加各地苏丹继承人就论文一事进行解释并道歉。之后，山口洋市各族社会贤达、宗教领袖和青年代表举行座谈会，并一致通过和平协议，以维护山口洋市的安宁与和平。黄少凡市长的做法不仅得到了苏丹王室的谅解，也得到其他族裔官员的好评。这不仅说明了各族群间加强交流的重

要性，也表明印尼华人的整体大环境已经改观。印尼华人应该认清这个现实，扭转不敢过问政事、明哲保身的观念，增强主人翁意识。作为印尼多元民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积极参政议政，为印尼的族际和谐、民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 [1] 参见《棉兰早报》M1 版，2010 年 6 月 22 日。
- [2] 本岛要闻，见《棉兰早报》M1 版，2010 年 5 月 21 日。
- [3] 查理士晓星：《珍惜千载难逢的良机》，《棉兰早报》M1 版，2010 年 2 月 23 日。
- [4] [10] 访谈陈金扬华人竞选小组领导人陈明宗、庄钦华、洪志通等所获悉资料。
- [5] 参见明眼人《棉兰人论棉兰市长选举》，《国际日报》B1 版，2010 年 6 月 28 日。
- [6] 纪录文献光碟：《华人移民史》，香港中文电台电视部录制，2010 年。
- [7] 周南京：《种族关系与国家建构：印尼华人个案

研究》，周南京《华侨华人问题概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06 页。

[8] J. Anto: *Dokter Penakluk Badai*, Solidaritas Tionghoa Center, Medan, November 2009.

[9] *Maju Untuk Perubahan: VISI DAN MISI*, Sofyan Tan - Nelly 竞选小组竞选宣传资料。

[11] *Sofyan Tan - Nelly Benar - Benar, Luar Biasa*, Analisa, Sabtu 8 Mei 2010.

[12] 李卓辉编著《坚强奋起百年复兴——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史话之四》，联通书局出版社，2009 年，第 7 - 8 页。

【责任编辑：王宣】

(上接第 71 页)

- [7] 黄凌风：《茅草行动改变中文报业生态：南洋的没落，张晓卿的崛起》，“当今大马”网站，<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74046>，2007 年 10 月 26 日。
- [8] 《华文小学高职问题基本解决》，《南洋商报》社论，1988 年 2 月 5 日。
- [9] 刘敬文：《行政偏差阴影下的华文教育——从华小高职事件谈起》，《星洲日报》1998 年 5 月 31 日。
- [10] 许子根：《我国教育制度评析》，《董总卅年》，1985 年 3 月 17 日。
- [11] 钟天祥：《综合学校计划掀起反对浪潮》，《星洲日报》1985 年 11 月 7 日。
- [12] 陈亚才：《尊重各族教育权利》，《新明日报》，1989 年 11 月 12 日。
- [13] 李万千：《“开放”声中的马来西亚华教问题与前景》，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 8 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 年，第 516 页。
- [14] 吕辉学：《从综合学校计划到宏愿小学》，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 8 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2001 年，第 269 页。
- [15] 同 [5]。

[16] 马来西亚华教董事联合会总会：《1996 年马来西亚华教工作研讨会总结报告》，转引自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 8 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 年，第 490 页。

[17] 郭洙镇：《法令阐明教长无权改制华小》，《星洲日报》1997 年 6 月 18 日。

[18] 郭全强：《我国华教工作者当前的任务》，《挑战与革新——1996 年全国华教工作研讨会资料汇编》，载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 8 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 年。

[19] 李万千：《“开放”声中的马来西亚华教问题与前景》，戴小华主编《当代马华文存》第 8 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 年，第 512 页。

[20] 张灿泉：《教育不能脱离现实》，《星洲日报》1985 年 3 月 31 日。

[21] 李宽容：《华小生国语程度低落问题》，《南洋商报》1992 年 8 月 28 日。

[22] 《从政策层面解决华教问题》，《星洲日报》社论，1999 年 12 月 13 日。

【责任编辑：王宣】